

# 框架竞争与危机走向：时空、形式、偏好 影响下的公众选择

马永驰，任昊杰，康传彬

**摘要：**危机发生后，相关方以公众为面向展开框架竞争，试图最大化地争取公众认同，获得危机应对和处理上的主动权。但已有的框架竞争研究明显忽视了公众选择，缺乏从框架竞争到危机走向的动态考察。本研究从公众选择这一关键中介出发，选取甘肃阳关林场事件为典型案例，在案例呈现与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出框架竞争、公众选择、危机走向三者关系的整合式模型。研究发现：意义建构的时空情境、意义给赋的形式差异、差序信任的固有偏好分别影响着公众对于危机有无的判断、证据真假的判断、主体善恶的判断，以上三重判断共同作用于公众选择的生成和支配性框架的确立。承载公众注意力的支配性框架是化解危机的靶向所在和重要参照，为政治问责和政策变革指明依据和方向，从而切实作用于危机走向。研究为打开框架竞争影响危机走向的黑箱提供了合适的切入点，有助于加深危机管理者对框架竞争、公众选择和危机走向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解。

**关键词：**框架竞争；危机走向；公众选择；支配性框架

**中图分类号：**D03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24)05-0117-17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240821.001

## 一、引言

危机发生之后，公众的情绪随之波动，危机的应对和问责也随之而来。但在危机问责之前，政府和公众都需要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进而为危机问责指明方向。也就是说，危机的定性与问责密不可分，有什么样的危机定性，就有什么样的危机问责。这就为危机相关方在告诉公众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留下了博弈与操作空间，该过程被危机管理的相关文献称之为危机的“框架竞争”<sup>[1][2]</sup>。每一个框架对应着一个版本的危机故事，而在每一个版本的危机故事中，相关方都被“框架”编织进了一套意义网络。例如，同样一个负面事件，在两套框架中可能分别以“天灾”和“人祸”的面貌来呈现，而同样一个危机的相关方，在一个框架中可能是“英雄”，在另一框架中可能是“罪人”。危机框架的意义网络决定了后续行动的正当性，因此，危机框架竞争的本质是正当性的竞争，这深刻地影响着后续的危机走向。

危机中的框架竞争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和竞争性。危机相关方会从各自利益出发，围绕危机的有无、责任的归因、未来的整改方向等关键点来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立场，编织对自己有利的素材，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危机管理中符号与仪式的作用机制研究”(21YJA630070)

**作者简介：**马永驰，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mayongchi@sdu.edu.cn(山东青岛266200)；任昊杰，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200433)；康传彬，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以期最大化地争取公众认同，将危机话语导向对自身最有利的局面，从而获得后续危机应对和处理上的主动权。在危机的框架竞争中，“框架”所面向的是公众，用以告之公众到底发生了什么（或是没有发生什么）；“竞争”则是指不同的危机故事版本最大化地争取公众认同的过程。因此，一个框架的影响力取决于公众是否理解并接受这个框架所指向的故事版本，以及由该故事版本所指向的意义网络。

在危机发生后众多分立的框架中，被公众最大程度接受的框架成为危机事件的支配性框架，代表着公众和政府的注意力方向，因而会深刻地影响危机事件的下一步走向，如危机中止于何处、危机问责的方向、政策变革的方向等。支配性框架确立的过程，同时也是公众选择的过程。由此观之，框架竞争、公众选择与危机走向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在三者的关联中，公众选择充当着框架竞争影响危机走向的中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前危机管理学界的框架竞争研究，主要集中于框架竞争的政治性和竞争性上，试图建立竞争性框架与政治性后果之间的静态对应联系。而公众选择的中介性，以及这一中介过程的动态性，则属于现有研究中完全被隐身的部分，也是明显缺失的部分。

框架竞争如果失去公众这一面向，则无从分析一个框架是如何从众多分立的框架中抓住公众的注意力而成为支配性框架。如果在框架竞争的研究中公众不在场，则失去了框架竞争与危机走向之间的动态联接，使二者之间变成了静态的点对点的关联，框架竞争的黑箱也就无从打开。因此本研究致力于弥补现有研究中缺失的部分，即聚焦框架竞争中公众选择的中介过程，探讨框架竞争、公众选择与危机走向三者之间的联系与作用关系。研究选取甘肃阳关林场事件进行案例分析，是因为该案例向我们展示了危机事件中框架的多样性与竞争的动态性，以及框架竞争与公众选择互动过程的丰富性。这样一个互动过程，可以丰富对当前危机管理中框架竞争与危机走向关系的理解。

## 二、框架竞争、危机走向与公众选择

### （一）框架竞争与危机走向

框架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社会学领域，由学者 Goffman 提出，其认为框架作为一种叙事结构，能够增进使用者对具体事实的定位、感知和理解<sup>[3] (P21)</sup>。随后，框架的概念广泛应用于心理学、语言学与话语分析、新闻传播、政治学与政策分析等领域，被视为一种描述和分析工具。其中心思想是：人们对事件的反应不是由事件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解释事件和赋予事件意义的方式决定的<sup>[4]</sup>。学者 Benford 在 1987 年提出了反框架的概念（Counterframing），也就是反驳、破坏、抵消既有框架的框架<sup>[5] (P75)</sup>。框架竞争这一术语则是由学者 Ryan 在 1991 年提出，即变革者与反对者（既有框架与反框架）之间的对峙<sup>[6] (P91)</sup>。在此基础上，学者 Entman 从问题定义、事件原因、道德评价、解决方案等方面对框架竞争进行了归纳<sup>[2]</sup>。框架概念在 21 世纪初被引入到危机管理领域<sup>[4]</sup>，用以描述和分析危机中的框架设定过程和策略，以及对后续危机走向的影响。当前危机管理领域的框架竞争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将研究的重心放在了危机框架的设定环节，另一类将研究的重心放在危机问责或危机变革等后果环节。前者更关注框架竞争中的竞争性维度，聚焦的是竞争性的过程，后者则更重视框架竞争中的政治性维度，聚焦的是政治性的影响后果。

在竞争性维度上，既有研究主要关注框架设定过程中的策略问题，即何种结构性特征的框架具有竞争优势和影响力。相关研究中有代表性的框架设定策略包括：给出时间证据、深挖制度背景、简化叙述方式、调用多种知识等。具体来看，给出时间证据是从时间的角度入手，呈现出反映危机历时性演变的证据<sup>[7]</sup>；深挖制度背景是从制度的角度入手，在识别既有制度多重影响的基础上趋利避害<sup>[8]</sup>；简化叙述方式是从叙述的角度入手，做到问题性成分和描述性成分的结合<sup>[9]</sup>；

调用多种知识是从知识的角度入手，平衡好专家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使用，以发挥专业优势和经验优势<sup>[10]</sup>。也有学者强调框架内容与文化元素的契合性，即框架内容不仅要遵循主流的政治理念，还要彰显公认的道德观念<sup>[11]</sup>。相关经验研究表明，合适的策略能够提升框架的显著性和自治性，符合受众的经验感知<sup>[12]</sup>，从而更易获得认同和支持。

在政治性维度上，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框架竞争对危机避责和危机变革的影响。一是在危机的框架竞争中规避自身责任。相关研究发现，涉事方在解释失败时会灵活归因和巧用修辞，同时基于减少对手指责的考虑，审慎选择观点和立场，这可能会得到政治对手一定程度的谅解，使政治问责的程度趋于弱化<sup>[13][14]</sup>。二是利用危机的框架竞争获得政策变革的话语权。已有研究表明，政治对手在危机发生后倾向于内部归因，从媒体报道和官方调查中寻找涉事方的漏洞，削弱涉事方的声誉和权威，从而让其在后续的政策变革中失去话语权和主导权，由此推动高强度的政策变革，并将政策变革导向对己方有利的方向<sup>[15][16]</sup>。

代表性研究方面，Boin对框架竞争和危机走向进行了类型划分，在静态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sup>[15]</sup>。第一类框架是否认危机，即强调危机并不存在，主张将事件惯常化，降低事件的重要性并淡化其不利影响。由于从风险到危机的临界点往往难以识别，因此该框架有可能被公众接受，所导向的结果是避免政治问责并得以维持现状。第二类框架是将危机视为威胁，即承认危机的发生，强调危机的不可预见性和不可控制性，将危机归咎于当事方之外的原因。如果当事方掌权且能够把控调查和问责的进程，则可将责任分散化，如果该框架最终胜出，导向的结果是低强度的政治问责和缓慢的政策变革。第三类框架是将危机视为机会，即承认危机已经发生，将危机归因于当事方内部的缺陷、失职和无能，揭露当前组织与政策的功能失调，进而凸显对当前组织与政策进行重构的必要性，如该框架最终胜出，所导向的结果则是高强度的政治问责和剧烈的政策变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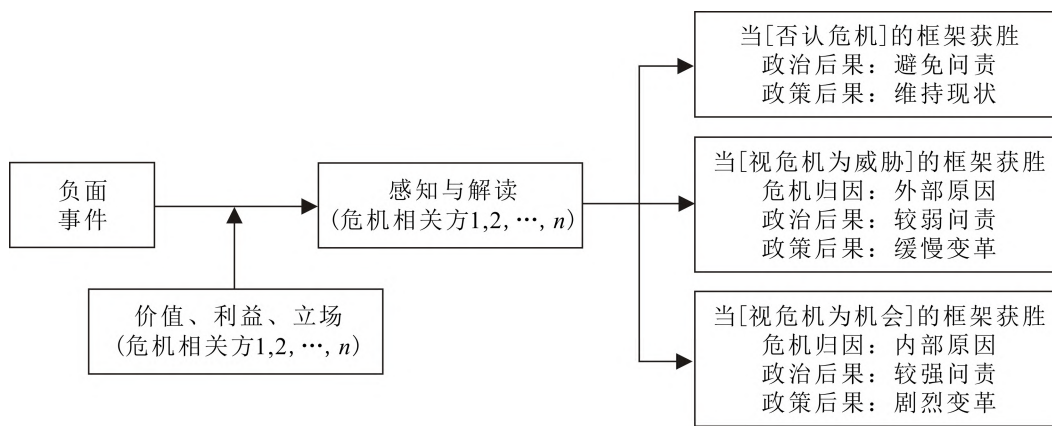


图1 框架竞争与危机走向关系的经典解释模型

## （二）危机框架竞争研究中缺失的一环：公众选择的中介性

在危机事件中，框架都是面向公众的。在框架意义网络的形塑下，公众的反应和注意力方向（即常说的民意）深刻影响着危机走向，因为具体实践中的危机管理者如果不考虑民意，也就是公众对事件的看法、反应、情绪和诉求等，那么任何实质性的下一步行动都有可能遭到公众愤怒情绪的反噬，甚至引发更大的危机。

进一步从学理上看，危机的本质是公众的核心价值（如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等）受到严重威胁，进而导致正常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秩序发生中断或崩溃<sup>[17]</sup>。如果危机处置不够及时，

不仅会直接影响公众的切身利益<sup>[18]</sup>,还会加剧公众情绪的波动,以及政府公信力与合法性的流失。因而危机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平复公众的情绪、恢复既有的秩序、修复政府的公信力与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公众的情绪和反应都是最终的依归,也是整个社会从危机状态恢复到常态的关键。如果公众的利益关切得不到回应,公众的负面情绪得不到平复,危机的结束自然就无从谈起。有鉴于此,无论是在现实的危机管理实践中,还是理论上的逻辑推演中,公众的反应与集体选择都是无法绕开的关键环节。因而公众选择深刻地影响着危机走向,充当着框架竞争影响危机走向的中介。

然而纵观危机管理领域的框架竞争研究,其典型地关注框架竞争策略与危机静态结局,未能围绕公众选择对危机框架竞争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公众的不在场与历时性考察的缺失,成为现有研究中缺失的一环。从方法论层面看,现有研究倾向于把框架竞争看成抽象的、静态比较的结果,所呈现出的是一幅机械的、刻板的、瞬间决定的、公众不在场的过度简化图景。但现实中所有的框架竞争都是面向公众的,都是为了赢得公众的认同,而且框架竞争是一个动态过程,并非框架一经提出就能在瞬间决定胜负。正如甘肃阳关林场案例所展示的那样,现实中的危机框架竞争过程是另一幅图景,如框架的调整、公众的摇摆、公众的分化、路径依赖、差序信任、质疑-回应-反质疑的交锋、调查组的替换、框架辩护方的改口,以及旷日持久的危机调查、重新调查、旋转和反旋转的过程。但在既有研究中,上述过程的典型特征,如框架的动态性、公众选择的动态性,以及公众的社会嵌入性,统统都被抽象掉了。

因此本研究通过案例深剖,重新回到现实,从过程的视角,聚焦于现有危机框架研究中被忽视的环节,也就是危机框架竞争的动态性与公众选择的中介性对危机走向的影响,以重新审视和修正框架竞争与危机走向关系的经典解释模型。为深入理解框架竞争、公众选择、危机走向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进行历时性的考察,即分析当多个竞争性框架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公众是如何反应的,以及公众的反应和情绪如何推动和改变危机走向。

###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呈现

#### (一)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个案研究的优点是可以充分挖掘案例信息,呈现更丰满的分析<sup>[19]</sup>(P63-70)。在方法的运用上,以定性的因果逻辑梳理为主,辅之以定量的文本计量证据。研究以甘肃阳关林场事件为典型案例,在呈现事实脉络的基础上拆解作用过程,同时借助Python抓取案例的公众评论数据,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文本分析。案例资料来源为新华社等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甘肃省及敦煌市的信息发布、网络平台的公众评论。

在文本分析方面,本研究抓取微博上的公众评论数据,分别进行词云分析和人工研判。具体程序为:第一步是抓取数据。案例在时间线上分为四个阶段,据此找到与各阶段相对应的微博话题。考虑到主流媒体受众面广、改变原始报道的可能性小,于是在话题中选择由多家主流媒体发布的微博,使用Python抓取其中的评论数据。第二步是提取有效数据。考虑到点赞量能够直接反映公众对评论的认可度,以及人工研判情感倾向的工作量<sup>①</sup>,研究选取了案例每一阶段点赞量排名前800的评论,存在点赞量相同的评论则一并计入,四个阶段共得到有效评论3200余条<sup>②</sup>。第三步

<sup>①</sup> 公众评论中蕴含的情感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包括承认危机、保持中立、否认危机等多种类型。由于机器学习对复杂情感的分析容易出现偏差,本研究采用了人工研判的方式,由研究团队共同开展。

<sup>②</sup> 微博中通常是点赞量高的评论排在前面,点赞量低的评论排在后面。这便于研究团队在使用Python进行评论抓取后,按照点赞量的高低进行二次选取,进而得到有效数据。

是进行词云分析和人工研判。在词云分析上,使用Python中第三方开源库Jieba对数据进行分词处理,考虑到不同关键词的字符长度差异,设置合理的字符长度,以尽可能地提取高频词,进行可视化分析。在人工研判上,研究团队不仅提炼和汇总了各阶段有代表性的公众评论,将其融入案例描述中,还对各条评论的情感倾向进行了逐一识别和交叉检查<sup>①</sup>,计算不同态度的占比情况,用于验证公众选择对危机走向的影响。

## (二) 案例呈现:甘肃阳关林场事件中的框架竞争

在甘肃阳关林场事件中,新华社与甘肃省面向社会公众展开了长时段的框架竞争,具体过程如下:第一阶段,新华社向公众曝光毁林事件,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第二阶段,为快速回应公众质疑和指责,甘肃省当即成立调查组,在自查自纠后召开发布会澄清。第三阶段,面对公众立场的摇摆和态度的分化,新华社公布三张官方文件的截图证据,为之前所述的防护林面积提供有力证明。第四阶段,中央积极响应公众对于彻查的关切,及时查清真相和公布结果,以安抚公众情绪。

1. 新华社向公众曝光毁林事件,引发公众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新华社率先察觉甘肃阳关林场的生态危机,主动向公众曝光毁林事件,这成为整个框架竞争过程的导火索。2021年1月,新华社主管主办的《经济参考报》发布长篇新闻报道《万亩沙漠防护林被毁 敦煌防沙最后屏障几近失守》,揭露阳关林场“剃光头式”砍伐防护林、大面积推广耗水多的葡萄种植、刻意淡化原有的公益林身份、有意掩盖现存的砍伐问题等行为。该报道中记录了林场职工和周边群众朴实的看法,例如“过去为林子流汗,现在为林子流泪”<sup>[20]</sup>。在新华社的带动下,《光明日报》《新京报》“观察者网”等主流媒体迅速跟进和转载,大量公众也加入了评论和转发的行列,例如在微博平台中,仅以话题“敦煌万亩沙漠防护林遭剃光头式砍伐”为例,其阅读量就高达9.2亿次,讨论量高达64.4万条。

从公众评论来看,震惊、惋惜和指责的声音不绝于耳,例如:“几代人的努力,多少人的辛苦,就这么毁了”“谁能负得起这个责,不考虑子孙后代吗”“十年才能树木,一定要彻查严查”<sup>②</sup>。其中有不少公众谈到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赞同媒体敢于曝光生态乱象的担当作为,同时也意识到毁林背后的利益复杂性。这些公众评论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呼吁有关部门尽快还原事件的真相,给公众、生态、国家一个完整的交待。

2. 为快速回应公众质疑和指责,甘肃省自查自纠并召开发布会澄清。持续发酵的公众舆论,将阳关林场及其属地管理方推上了风口浪尖。在新华社曝光毁林事件当天,甘肃省立即向公众做出表态,派专门调查组随即前往阳关林场,会同酒泉市和敦煌市全面调查、核实媒体反映的问题<sup>[21]</sup>。此时的公众态度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征。一部分公众期待甘肃省能查出让人信服的结果,例如:“调查终于来了,给大家一个真相吧”“支持调查,坐等后续”。另一部分公众怀疑自查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寄希望于中央政府的介入,例如:“自己查自己能行吗,这事儿必须中央来查”“还是国务院牵头比较好,自查可能查不明白”。在调查6天之后,甘肃省面向社会公众召开新闻发

<sup>①</sup> 人工研判的具体步骤为:第1轮,组建4个研判小组(每组2人),每组负责研判案例一个阶段的800条评论,即组内每人负责研判400条评论。第2轮,进行组内的交叉检查,即每人研判同阶段的另外400条评论,标注两次研判结果有分歧的评论(研判一致率为89%)。第3轮,进行组间的交叉检查,完成对所有评论的三次研判,汇总研判结果不一致的评论,交由其他小组再进行研判。最后是共同讨论情感研判有分歧的评论,确定最终的情感类型,计算各阶段不同情感类型的占比情况,该计算结果详见文内图5。

<sup>②</sup> 案例各个阶段所举的公众评论,都来源于微博平台的相关话题,下同。每阶段都能在微博上找到对应的话题讨论,例如话题“敦煌万亩沙漠防护林遭剃光头式砍伐”、话题“甘肃通报敦煌防护林被毁调查”、话题“敦煌毁林有图有真相”、话题“敦煌阳关林场防护林被毁调查结果”等。

布会,详细通报调查情况。

调查组在发布会上称,阳关林场长期以来只有6 000余亩防护林,未发现防护林大面积减少的情况,且葡萄园面积从2013年之后再无增加<sup>[22]</sup>。一方面,调查组认为媒体报道失准,将防护林面积、林场经营管理面积、其他生活用地面积相混淆。另一方面,调查组承认阳关林场管理较粗放、日常工作不到位等惯常问题,表示将尽快整改到位。对此,一些公众倾向于相信调查结果,代表性的看法有:“不包庇、不回避、有措施、有整改,为甘肃和敦煌点赞”“调查有数据有比较,应该还是很可信的”“尊重调查结果,希望大家不要盲目起哄”。当然,仍有许多公众认为调查结果有待商榷,代表性的看法有:“防护林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我们需要明确的视频证据”“新华社的报道里有那么多树被砍了,你让我怎么相信调查结果呢”“自己查自己的说服力不够,必须得中央出手了”。甘肃省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后,缓解了自身在框架竞争中的被动,获取了部分社会公众的信任,使公众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

3. 面对公众立场的摇摆和分化,新华社以官方截图为据确证防护林面积减少。当公众的立场出现摇摆和分化,新华社在行动上未曾拖沓,向公众摆出简练有力的新证据。在甘肃省新闻发布会的后一天,新华社在微博、微信等平台同步发文,把分歧点锁定在防护林面积这一关键问题上,将能够证明防护林面积的官方文件截图呈现给公众,坚持“有图有真相”<sup>[23]</sup>,为防护林面积明显减少提供力证。三份证据共同证明防护林面积为13 300余亩,而不是甘肃省所言的6 000余亩(如表1所示)。新华社虽未作出过多的文字解读,但对于公众而言,面对多份具备权威性的证据,孰真孰假、孰对孰错自然显而易见。

表1 新华社公布的三份截图证据

文件年份及名称	截图中的关键字段	署名单位
2016年《酒泉市关于中央第七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信访投诉环境问题查处情况》	经敦煌市核查,2005年11月敦煌市企业化事业单位改革领导小组批准的经营总面积25 700亩,其中防护林13 300亩,葡萄园3 283亩,其他用地9 117亩	酒泉市人民政府
1997年《国营敦煌阳关林场关于发展优质葡萄基地的可行报告》	1963年国家投资兴建的以防风固沙为主的防护型林场,现经营面积25 000余亩,其中防护林14 000亩	国营敦煌阳关林场
2005年《国营敦煌阳关林场改制方案》	全场经营总面积25 700亩,其中防护林13 300亩,葡萄园3 283亩,其他用地9 117亩	敦煌市林业局

此时,公众在大力褒扬新华社正义之举的同时,也在严厉地批评甘肃省造假的做法,要求中央彻查毁林真相、严惩失职渎职、完善护林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代表性的看法主要有:“新华社就是有魄力,要多一些主动发现问题、敢于刨根问底的媒体”“发布会歪曲事实和敷衍公众,有本事请继续回应”“中央调查组快点来解决吧,破除保护伞,还大家真相”。在此之后,甘肃省未作出进一步回应,公众内心的信任天平已经完全倾向于新华社一方。

4. 中央积极响应公众对彻查的关切,在彻查后及时公布真相并安抚公众情绪。为响应公众对于事件彻查的普遍关切,中央及时成立由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草局共同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及时对毁林事件作出回应,表示联合调查组已经赶赴当地,将及时公开最终调查结果,依纪依法进行严肃问责<sup>[24]</sup>。此时,许多公众发出了“持续关注”“必须严惩”“等待明确结果”的呼声。调查组综合运用遥感影像、现场勘查、无人机测绘、问询谈话、查阅资料等方式,对所获资料进行详细梳理、汇总和分析,最终确认新华社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具体体现在防护林减少、葡萄园增加、毁林开垦、防护林质量下降、水资源错配、违规批准承包等方面<sup>[25]</sup>。阳关林场内部管理混乱、属地监管缺位、部门履职不力等人为原因,也在联合调查中被一一揪出。在调查报告向社会发布时,甘肃省已经确立整改方案,成立整改工作指导组和失职

读职专案组,由国家部委直接监督落实情况。这带来了一系列的政治影响和政策影响,比如当地人员监管不力和履职不力等行为受到了严肃问责,林权登记政策、防护林保护政策、公益林管理政策得到了针对性完善。自此之后,国家林草局部署开展了全国打击毁林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强问责和变革的力度。

随着毁林真相浮出水面和问题解决提上日程,公众的情绪得到了安抚,其面对真相的反应具备显著一致性:对于中央政府重视民意和体察民情的举措,持以高度肯定;对于新华社尊重事实和执著为公的品质,持以由衷赞同;而对于地方政府遮掩事实和逃避责任的做法,进行了比之前更为严厉和集中的批评。较具代表性的看法有:“政府越来越关心民意,这就是咱们老百姓的好政府”“新华社严追真相,给人民一个好交代”“之前的自查和辟谣都是闹剧,必须重惩严惩相关人员”。自此,甘肃阳关林场事件中的框架竞争宣告结束,舆情危机逐渐趋于平息,被破坏的生态也逐渐趋于恢复。

从案例呈现可知,公众立场、态度和看法的变化,不仅是媒体和政府等危机相关方建构和调整框架的直接依据,也是推动框架持续博弈、事件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正如最先揭露毁林事件的记者王文志所言:“这是一次公众的胜利。”<sup>[26]</sup>案例清晰地表明,社会公众在经历波折后最终选择了新华社的框架,而且公众选择受到了中央政府的重视和认可,进而引发了中央彻查之下的政治问责和政策变革,促使危机走向解决。

#### 四、案例分析:框架竞争中公众选择过程的拆解

厘清框架竞争如何通过公众选择来影响危机走向,关键在于拆解框架竞争中的公众选择过程,识别背后的作用路径。正如案例所示,框架竞争过程是先有多个框架的提出,后有框架向公众的传递。框架的提出在本质上是危机相关方对危机事实的意义建构(Sensemaking),即危机相关方在接收感性信息的基础上,通过设定、剪裁、保留等加工程序,塑造可被公众理解的意义网络<sup>[27][28]</sup>。而框架向公众的传递在本质上是危机相关方对公众的意义给赋(Sensegiving),即通过一定的形式把已经建立的意义传递给公众,试图影响其对于事件的理解方式<sup>[29][30]</sup>。新华社和甘肃省在意义建构上选择了不同的指向,在意义给赋上使用了不同的形式,这加剧了框架之间的差异性和竞争性,同时也构成了公众选择的客观背景。

从案例中可以发现,公众要做出选择,首先需通过新华社和甘肃省的框架内容来判断危机的有无,对危机事实形成最起码的认知和了解。如果没有对危机有无的判断作前提,就谈不上选择的问题。进言之,新华社和甘肃省在向公众表达危机有无的“真相”时,均提供了一定的证据,这体现为文字、图片等特定的形式。只有通过特定的形式,公众才能判断证据的真假,比较框架的信服力。基于危机有无和证据真假的判断,公众选择通常会渐具雏形。但面对中央媒体和地方政府这两个身份不同的竞争主体,公众自身具备固有的信任偏好,即差序信任。公众对于主体善恶的判断受到差序信任的影响,谁更能代表公众的利益,谁的初始信任水平往往会更高,也更有避免公众指责。公众综合考量危机有无、证据真假、主体善恶三重判断,最终选择了新华社框架。新华社的内部归因框架成为支配性框架,为中央的危机处置提供了参照。这触发了较强的政治问责和政策变革,切实作用于危机走向。

##### (一) 公众选择与支配性框架的确立

1. 意义建构的时空情境影响公众对于危机有无的判断。公众对于危机有无的判断是做出选择的前提,而这种判断只能从危机相关方的框架内容中得来。新华社和甘肃省塑造框架内容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意义建构的过程。鉴于危机事件是空间性和时间性的结合体,意义被完整地建构起来,就

需依赖于特定的时空情境。正如案例中表明，新华社和甘肃省均赋予了阳关林场事件具体的空间意义和时间意义。其中，空间意义指的是危机的存在性，即危机事件在特定空间场域内是否发生，时间意义指的是危机的持续性，即危机事件何时发生和持续多久。二者构成的时空情境共同影响着公众对于危机有无的判断。以下分析空间意义建构和时间意义建构的具体影响机制（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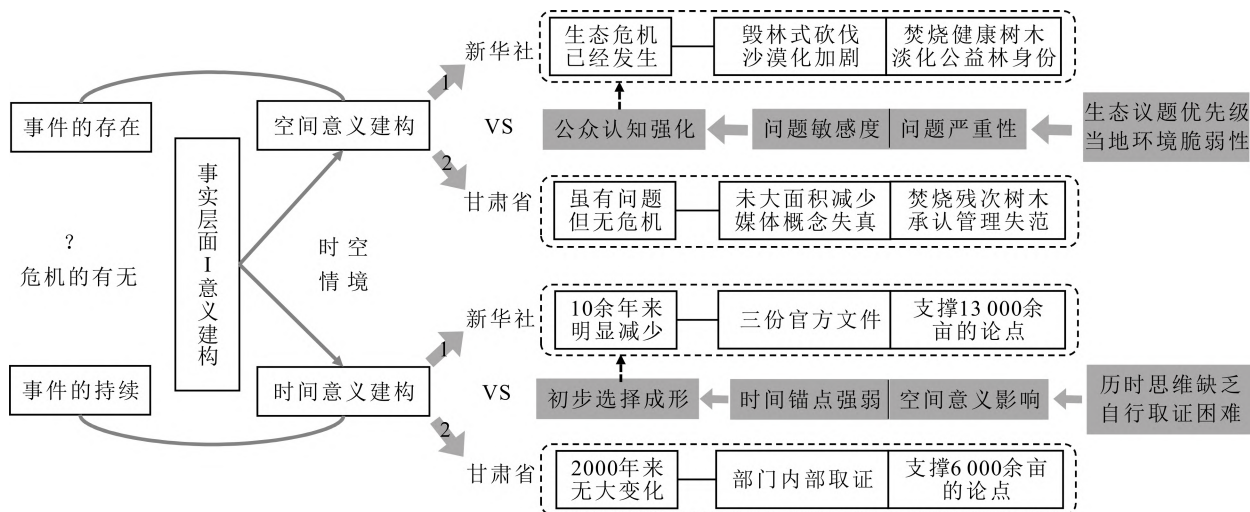


图2 空间意义建构和时间意义建构的具体影响机制

在空间意义上，新华社和甘肃省面对相同的空间信息，却建构出完全对立的意义。新华社在察觉危机信息流之后，率先面向公众建构了“生态危机已经发生”这一空间意义，在系列报道中列出能支持空间意义的事实，比如实地调查资料、官方政策文件等。而甘肃省的空间意义建构具有后发性和被动性，不得不应对公众在新华社框架影响下发出的指责和批评。为在公众关切和避责考量之间找寻适度的平衡，甘肃省在自查自纠后巧妙建构了“虽有问题但无危机”这一空间意义，既坚决否认了防护林面积减少，又对媒体反映的问题进行了程度弱化，将其归咎于林场日常管理粗放等常见问题。由于生态问题优先级不断攀升，公众本就持有较高关注度；且阳关林场地处生态环境脆弱的敦煌，其生态破坏将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和文化遗产保护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这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对问题严重性和敏感度的认知。加之新华社记者的实地考察和部分当地群众的证实，无论防护林被毁是否真实存在，公众大多倾向于相信生态破坏已然发生。由此，新华社所建构的空间意义更易被公众接受。

时间意义对公众的历时性思维要求较高。由于公众难以对危机随时间的变化作出精确判断，且自行取证困难，因而时间意义建构的关键是找到有关时间说明的可信锚点。新华社框架对阳关林场“剃光头式砍伐”的时间限定词是“近十余年来”，且在后续报道中明确给出了十余年前官方文件中关于林地面积的字段。甘肃省框架对“防护林面积未减少”的时间限定词是“2000年以来”，指明新华社在建构时间意义时存在经营面积和防护林面积的概念混淆。相比之下，新华社运用多份官方文件，将时间意义锚定于既有官方文件中“林地面积”这一字段之上，具有较强的权威性，而甘肃省则用自我调查的数据做支撑，具有较多的操作空间。虽然双方的框架均指向了较长的时间跨度，但公众还是能够依照双方时间锚点的强弱做出区分。此外，考虑到空间意义和时间意义的紧密相关性，公众对时间意义的选择很可能受到空间意义选择的影响。这意味着在空间意义上取得先发优势的新华社框架在时间意义上更易取得优势。由此观之，双方在时间锚点强弱上的对比以及在空间意义较量上的优劣势，使公众倾向于接受新华社所建构的时间意义。

2. 意义给赋的形式差异影响公众对于证据真假的判断。公众对危机的有无做出判断, 只是对危机存在与否形成了初步认知。框架竞争者还需将危机存在的具体形态传递给公众, 这就需借助文字、图片等特定的形式, 向公众呈现代表真相的证据, 来进一步增强真实感。公众正是根据意义给赋的形式差异, 来判断框架竞争者证据的真假, 由此进一步强化选择倾向。从案例中可知, 政府与媒体作为性质不同的相关方, 其采用的意义给赋形式常常存在差异: 政府关注意义给赋的正式性, 一般通过新闻发布会传播大量文字信息; 媒体关注意义给赋的可视化, 一般通过简单形象的图片吸引公众注意力。不同形式的选择支持着危机相关方想要凸显和强调的某个侧面。诚如 Boin 所言, 与危机相关的每一个用语、图片和姿态都至关重要<sup>[31] (P93)</sup>。意义给赋形式的差异影响着框架在公众视野中的显示度和标识度, 进而影响公众对于证据真实性的感知 (如表 2 所示)。在公众视野中真实感越强的框架, 越容易在给赋形式的较量中脱颖而出, 从而引导公众做出相应的选择。

表 2 意义给赋的形式差异及其影响

竞争主体	给赋形式	优点	缺点	受众影响	举例
媒体	可视化 信息传递	感染力强 传播力强	正式性偏弱 权威性偏弱	强化问题显示度 强化情境代入感	图片 视频
政府	冗余化 信息传递	正式性强 权威性强	感染力不足 传播力不足	难以把握信息重点 难以推知危机影响	文本信息 话语符号

互联网时代的媒体传播可起到显著的议程设置效果, 通过对特定信息的强调来影响公众的注意力方向<sup>[32]</sup>。新华社以图片形式将砍伐的树桩、裸露的沙地、卫星遥感面积等证据传递给公众, 增强了危机发生的真实性, 以此证明防护林被毁的事实。在新华社的带动下, 国内诸多官方媒体、商业媒体和自媒体在短时间内大量转发图片证据, 形成“阳光林场防护林被毁”的媒体共识。这些媒体以事件为导向、以图片为依托的报道方式, 有助于降低公众的理解难度并使其把握关键信息。图片不仅具有较强的可视功能和感染力度, 还作为一种传播学意义上的“不变组件”(Immutable Mobile)<sup>[33] (P227)</sup>, 其中附带的证据性信息相较于文字而言不易发生变形。因而图片能够将公众自然地带入危机情境之中, 使公众充分感知危机的严重程度和影响程度, 从而塑造其对框架的显著印象, 强化框架的真实感。

与新华社等媒体不同, 政府一般以新闻发布会向公众传递正式的文本信息和话语符号, 实现意义给赋。甘肃省在 6 天调查后召开发布会, 以回应媒体反映和公众批评。该方式虽能彰显政府信息发布的正式性和权威性, 但不可避免地在话语表述中附带一些欠缺必要性的文字, 产生话语冗余<sup>[34]</sup>。甘肃省虽提供确切数据并多次强调“没有证据表明防护林被毁”, 但其说服力仍然较弱。在文字形式下, 公众既无法自然地进入危机情境之中, 也难以直观地把握框架所意图呈现的重点和推知危机的具体影响。在省新闻发布会后, 新华社用三份官方文件的截图来力证“防护林 13 000 余亩而非 6 000 余亩”的观点, 这使得发布会的效力大为削弱, 也使得甘肃省的文字证据受到普遍的质疑。新华社凭借可视化的意义给赋形式, 向公众呈现出更有信服力的证据和更具真实感的框架, 进一步获得公众认同。

3. 差序信任的固有偏好影响公众对于主体善恶的判断。公众对危机有无和证据真假的判断, 都属于对框架本身的判断。除此之外, 公众还会对框架提出者做出判断。通常而言, 越能代表公众利益的框架提出者, 越容易在公众的潜意识中获得更好的印象, 更可能被公众贴上“善”的标签。案例反映出中央媒体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框架竞争, 而且中央媒体具备显著的政治嵌入性, 这对公众选择具有深刻影响。既有研究已充分证明, 公众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度普遍高于对低层政府的信任度<sup>[35]</sup>。这样一种内隐的差序信任偏好能发挥出自内而外的驱动效应, 使公众对主体正义与

否作出判断。

差序信任偏好具有稳定性和普遍性，这可从央地的角色分异和绩效统属、公众的权威依赖和日常感触等方面找到答案。一方面，中央是护林政策的制定者和宏观统筹者，地方是护林政策的执行者和微观治理者。面对现实毁林问题，公众常将责任归咎于既有政策在执行中的变异和地方政府治理的不力。即使地方政府取得较好的护林绩效，民众也可能归功于中央的正确指导。另一方面，公众对政府权威的依赖程度与层级呈正相关<sup>[36]</sup>，在日常生活中对地方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违背行为有着真切感触，也对地方政府的负面新闻消息习以为常<sup>[37]</sup>。公众在差序信任影响下会主动识别框架提出者的身份差异，给定其不同的信任水平（如图3所示），从而作出主体善恶的判断。

新华社是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媒体，与甘肃省的行政级别相等。虽然新华社不具备甘肃省所拥有的实际公权力，但可在框架竞争中潜移默化地借来自中央的信任资源。新华社鲜明的政治标识，使得其与中央政府的身份界限在公众视野中趋于模糊化，即“新华社代表国务院”的认知可能日渐成为公众的共识。公众对新华社框架的信任，也是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延伸。因此，媒体凭借政治嵌入性所获得的差序优势，弥补了基于身份性质所产生的公信力劣势，从而在公众的主体善恶判断上占得了先机。在压力型体制之下，甘肃省受制于央地关系的固化样态，倾向于遵从中央政府权威，但并不会自发地屈从于媒体的框架压力。若将公众的范围限定在甘肃省内，地方政府通常拥有对事件的优先解释权，新华社不一定就能在公众的主体善恶判断上取得胜算。这同时也表明，甘肃省的公信力较难突破地域范围的限制，无法通过身份性质获取更广范围公众群体的认可。而差序信任的固有偏好能够对不涉及地域牵扯和利益纠葛的第三方公众发挥隐性作用，使其在主体善恶判断上倾向于新华社一方。

公众对于危机有无的判断、证据真假的判断、主体善恶的判断在指向上具有一致性，在三重判断的综合作用下，公众选择最终生成。其中，危机有无和证据真假是公众对于框架这一客体的判断，主体善恶则是公众对于框架提出者这一主体的判断。得益于客体判断和主体判断的叠加效应，公众才能做出稳定的选择。新华社框架正是在三重判断上均取得了相对优势，才能在公众选择中顺利输出，成为后续危机叙事的支配性框架。

## （二）公众选择过程对危机走向的影响

从过程视角来看，公众选择确立了支配性框架，支配性框架则为后续行动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并划定了边界。首先，公众选择为中央的实质介入提供了正当性。从公众与政府的关系看，公众是中央政府的委托方，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看，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理方。因此，从法理上讲，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需要对公众负责。面对公众日渐高涨的彻查呼声和甘肃省日渐损耗的公信力，中央不得不正面回应委托方的迫切诉求，切实处理代理方的信任困局，以防范事态扩大和社会失序。其次，公众选择为中央的事实认定提供了主基调。公众选择不是个体的主观随意选择，而是公众整体意志的体现。因而公众选择所确立的支配性框架在危机有无和危机归因上具有天然的合法性，通常能够得到中央政府的尊重和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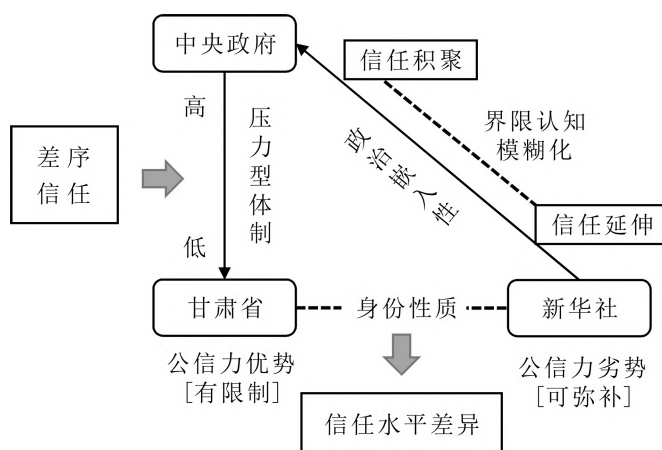


图3 差序信任对框架选择的影响机制

最后, 中央政府作为理性决策者, 倾向于从全局的角度权衡利弊, 尤其是在危机情景中, 不得通过回应公众诉求来维护公信力与合法性体系。正如社会学中的托马斯定理所言, 公众所认为的事实比事实本身更为重要<sup>[38]</sup>。因而回应公众认定的危机成为结束危机的必然选择, 这一点不以当权者的主观意愿为转移。中央政府回应公众认定的危机, 其理性决策的操作空间在于, 要么从行动层面上回应公众当前认定的危机, 要么从认知上改变公众当前认定的危机。前者意味着中央政府接受公众输出的支配性框架作为危机处理的参照, 通过回应公众的当前诉求来结束当前的危机。后者意味着中央政府将提出自己的框架参与竞争, 让公众在新一轮框架竞争中重新选择, 通过改变公众认为的危机, 来输出契合自身意愿的新的支配性框架, 并以新的支配性框架为参照, 在行动层面上结束危机。无论中央政府选择哪一种方式, 公众选择生成的支配性框架都是化解危机的靶向所在和重要参照, 区别仅在于参照的是当前的支配性框架, 还是重新迭代后的支配性框架。

甘肃阳关林场的案例属于第一种情况。阳关林场事件作为由生态破坏与网络舆情交织而成的跨界型危机, 涉及生态环境保护、文化资源传承、社会安全稳定等议题类型<sup>①</sup>, 且这些议题类型受到了中央政府越来越多的重视, 位于其注意力结构的中心地带。在此情况下, 公众选择输出的支配性框架本身就符合中央政府对环境治理和整顿的意愿, 这一点从中央政府的高效回应也可看出: 在新华社发布新证据的第二天, 中央就立即组建多部委联合的调查组, 在悬置甘肃省调查结果的同时启动全面深入的二次调查, 根据调查结果进行了严肃问责, 并开展了全国性打击毁林专项行动。

为进一步验证公众选择对危机走向的影响, 研究绘制出公众评论词云图(如图4所示)。由图中高频词可知, 公众评论的聚焦点呈现出如下趋向: 从抨击毁林行为, 到质疑自查结论, 再到指责数据造假, 最后是诉求得到重视的欣慰; 且公众要求中央介入、彻查和严惩的呼声贯穿始终。



图4 案例各阶段公众评论的词云图和高频词

① 该事件的发生地处于生态环境脆弱、周围遍布沙漠、文化底蕴丰厚的敦煌。大面积毁林不仅破坏了西北地区的防沙屏障, 将附近群众生产生活 and 珍贵文化资源置于风沙侵袭的危险之中, 还可能间接地影响到其他地区的空气质量, 由此引发社会公众的普遍关切和强烈呼吁。

这表明绝大多数公众承认危机的存在，倾向于将危机归为内因，反映出对新华社框架的认可和接受。计算案例各阶段公众评论的态度占比，可知公众选择在“承认危机”“保持中立”和“否认危机”上的变化，以及在框架竞争和公众选择的影响下，危机在若干种走向上的切换。据此可更直观地展现公众选择对危机走向的影响程度（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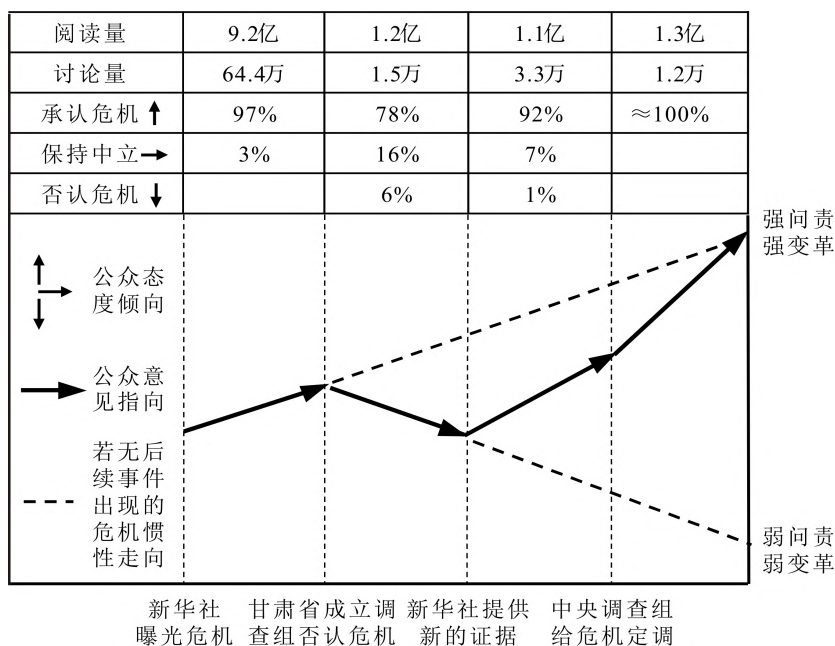


图5 阳关林场事件中公众选择对危机走向的影响

就危机的本质而言，公众选择是公众在核心价值受到严重威胁时的自我挽救，其中蕴含着担忧、质疑、指责等多重负面情绪。为切实安抚和疏导公众情绪，防范同类危机对公众带来再次冲击，中央采取严厉问责和坚决变革实为必需之举。由此可见，框架竞争中的公众选择过程，对于危机走向具有重要影响。

## 五、分析模型与理论对话

案例分析表明，公众选择是框架竞争影响危机走向的中介。案例的启发性在于揭示了公众选择的中介作用，为理解框架竞争、公众选择、危机走向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 （一）公众选择视域下的框架竞争

从公众选择视域出发，能够完整地提炼框架竞争的维度。Entman所讲的问题定义、事件原因、道德评价和解决方案等要素，本质上都属于框架的内容，是框架提出者在意义建构环节所确立的。但框架竞争不只有内容上的竞争，意义建构环节也是竞争过程的一部分。基于公众选择视域，需将框架与公众之间、框架提出者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纳入视野。

一方面是框架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性。这涉及意义给赋形式的问题，即竞争性框架通过何种形式向公众传递意义网络。相对于文字而言，图片和视频更能营造出真实感，进而在意义给赋之争中占优势。另一方面是框架提出者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性。这涉及主体信任水平的问题，即公众在考虑提出者身份时更相信谁。对于不同性质的媒体和不同层级的政府，即使其建构相同的意义且采用相同的形式，公众的认可度也会存在差异。因而框架竞争不仅是意义建构内容的竞争，也是

意义给赋形式的竞争，还是主体信任水平的竞争。这三个维度都是围绕公众选择展开的，因为框架提出者会根据公众认可度来建构和调整意义网络，选择能影响公众和令其信服的给赋形式，运用身份标识和关系嵌入性来获取公众信任。

Entman显然只关注到了意义建构环节，忽视了意义给赋环节，也未考虑竞争者身份差异中蕴含的信任水平较量。本研究在公众选择视域下予以修正，完整提炼出框架竞争的维度（如图6所示）。其中，意义建构内容之争指的是问题定义、事件原因、道德评价和解决方案等方面的竞争，意义给赋形式之争指的是不同形式往往带来不同的感知效果和可信程度，而框架提出者的身份是相对独立的元信息，其信任水平之争同样是框架竞争的重要一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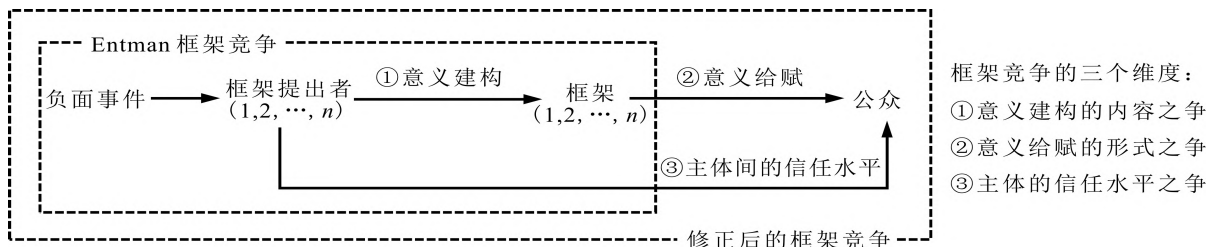


图6 公众选择视域下框架竞争的维度

(二) 基于公众选择的整合性分析模型

一般化分析模型旨在提供扎根个案、超越个案的中层解释。建构分析模型时，需从案例中提炼共性的分析层面。案例研究表明，新华社和甘肃省的框架都包含着事实层的情况描述、形式层的证据呈现、价值层的责任归因等要素，公众选择则是危机有无的事实判断、证据真假的判断、主体善恶的价值判断共同作用的结果。据此可提炼出事实、形式、价值三个分析层面，因为不同框架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上与公众产生连接和互动，公众也是综合考量这三个层面才做出选择。当然，该案例在框架提出者身份和危机走向上具有特殊性。一方面，不同性质的媒体、不同层级的政府、各类组织和民间意见领袖都有可能参与框架竞争，其身份不限于中央媒体和地方政府。另一方面，“否认危机”“视危机为威胁”“视危机为机会”等框架均有胜出的可能，危机走向可以是不同强度的政治问责和政策变革。基于上述考量，研究围绕框架竞争、公众选择、危机走向的关系构建出整合性分析模型（如图7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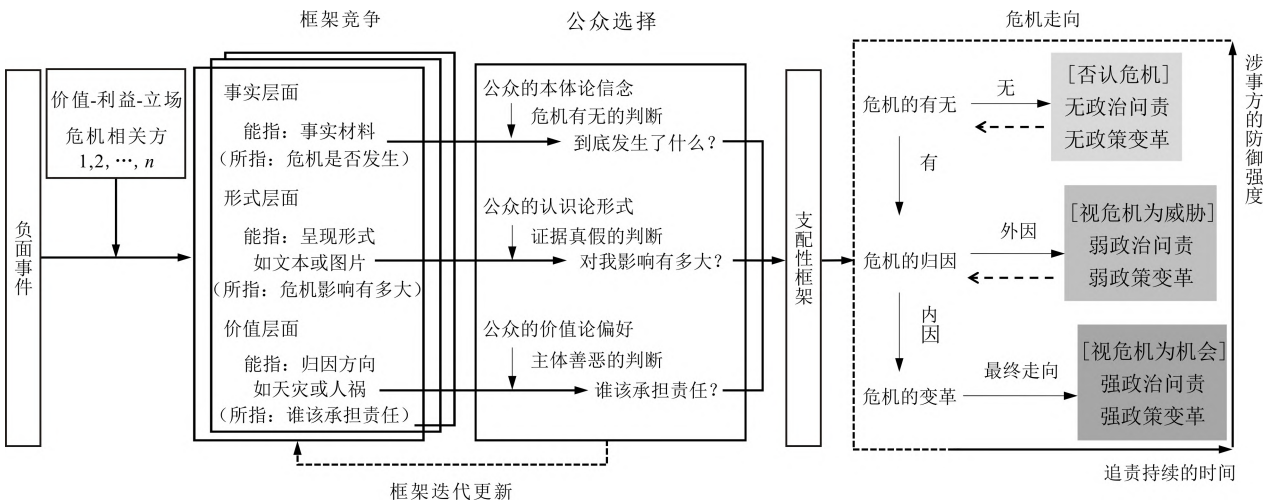


图7 “框架竞争-公众选择-危机走向”的关系模型

修正后的新模型与Boin经典模型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其选择吸纳了经典模型中的合理成分，即以负面事件的发生为模型建构起点，以危机相关方的价值、利益、立场为关键考量因素，以“否认危机”“视危机为威胁”“视危机为机会”为框架基本类型，以政治问责和政策变革为刻画危机走向的主要角度。但经典模型的局限在于，把框架提出者和框架类型放在核心位置，将框架竞争与危机走向的关系看成静态的、点对点的连接，忽视了公众选择的中介性和这一中介过程的动态性。鉴于此，新模型的修正和拓展之处在于：将公众选择及其输出的支配性框架放在核心位置，重点揭示了公众选择生成与支配性框架输出的动态过程，直观呈现出多种危机走向之间的转化关系。新模型实现了对经典模型的辩证扬弃，突破了既有模型中框架竞争与危机走向之间的静态化、简单化连接，能够从公众选择的视角更为完整地解释框架竞争影响危机走向的脉络。

具体而言，当负面事件涌现时，不同危机相关方结合自身的价值、利益和立场，对该事件进行感知和解读，形成多个对立性框架。在事实层面上，框架竞争者通过建构不同的时空情境，来影响公众对于危机有无的判断，解答“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困惑。在形式层面上，框架竞争者通过选用不同的给赋形式，影响公众对于证据真假的判断，解答“对我影响有多大”的困惑。在价值层面上，公众在自身信任偏好的驱动下对竞争者的善恶作出判断，从而厘清“谁该承担责任”。这三重判断属于人类最底层的能力范畴，因此会受到本体论信念、认识论形式和价值论偏好的潜在影响。三重判断如果指向一致，将会促使公众选择的生成与支配性框架的确立。三重判断如果在指向上冲突，公众内部很可能产生选择分歧，无法输出支配性框架。同时公众的选择分歧会驱动框架迭代更新，带动新一轮竞争过程的展开。

面对公众选择确立的支配性框架，中央政府要么从行动上回应公众当前认定的危机，要么从认知上改变公众当前认定的危机。后者意味着新一轮框架竞争和公众选择的开始，直至符合中央政府意愿的新支配性框架确立。支配性框架进入政策议程之后，其对于危机走向的影响路径有如下几种情况。如果支配性框架为“否认危机”，其带来的危机走向通常为无政治问责、无政策变革。如果支配性框架为“视危机为威胁”，其带来的危机走向通常为弱政治问责、弱政策变革。如果支配性框架为“视危机为机会”，其带来的危机走向通常为强政治问责、强政策变革。前两种走向都有可能向第三种走向转化。因为随着追责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涉事方的防御程度越来越低，“否认危机”或“视危机为威胁”等被公众选择的框架有可能重新受到公众的指责和质疑，从而掀起新一轮框架竞争，在事实、形式、价值三个层面的影响下形成新的公众选择。这可能会纠正先前对危机有无和危机归因的认识，触发新的危机走向。一般而言，政治问责和政策变革都较强的第三种走向，是危机的最终走向。

### （三）基于中国情景的理论对话

甘肃阳关林场案例表明，框架竞争不是竞争者内部的策略博弈，而是以公众为面向的公开较量。以Goffman、Entman、Boin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虽对框架竞争展开了较多讨论，但存在忽视公众选择、缺乏动态考察等短板，也难以回应中国情景下的特殊性。缺失了公众这一面向，就无法揭示竞争性的框架如何过渡到政治性的结果，也难以呈现框架竞争影响危机走向的具体脉络。因而本文致力于让研究中的公众选择回归到与实践中等重要的位置。

具体到中国情景下，危机框架竞争的独特之处在于竞争者的行政级别、公众的差序信任、央地关系的不平衡性。这意味着源自西方的框架竞争理论难以解释中国的危机事件过程。一是竞争者的行政级别。官方媒体和国有企业等框架竞争者具有政治嵌入性。相对于商业媒体、民营企业、民间意见领袖而言，其在参与框架竞争时具备身份优势。二是公众的差序信任。差序信任作为中国社会的普遍观念，影响着公众对于框架提出者的固有信任水平，能够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而差序信任的应用空间也可进一步拓展，不应局限在政府内部，可延伸到政府、官媒、国企的信任水平比较中。三是央地关

系的不平衡性。在压力型体制的影响下, 中央掌握着对地方的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sup>[39]</sup>。Boin的经典观点“当权者对于政治调查的掌控有助于在竞争中取胜”<sup>[15]</sup>, 可能需要重新审视, 因为地方政府对地方性调查的掌控并不能完全左右框架竞争结果, 公众选择和中央审查才是关键因素。中国情景下的框架竞争研究亟需关注上述特殊性, 基于本土案例构建适用的分析模型。

## 六、结论与讨论

理清框架竞争、公众选择、危机走向的关系, 对于危机管理者优化应急处突效能、捍卫公众核心价值、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已有研究忽视公众选择、缺乏动态考察等缺陷出发, 选取甘肃阳关林场事件为典型案例, 分析了框架竞争中公众选择的过程及其对于危机走向的影响, 构建出框架竞争、公众选择、危机走向的整合式模型。研究发现如下。(1) 公众选择是框架竞争影响危机走向的关键中介, 支配性框架确立的过程, 同时也是公众选择的过程。支配性框架的确立, 既不是单方面取决于框架的内容和形式, 也不是单方面取决于公众的信任偏好和既有观念, 而是由框架和公众联合决定的。(2) 意义建构的时空情境、意义给赋的形式差异、差序信任的固有偏好分别影响公众对于危机有无的判断、证据真假的判断、主体善恶的判断, 三重判断共同作用于公众选择的生成和支配性框架的确立。(3) 承载公众注意力的支配性框架是化解危机的靶向所在和重要参照, 为政治问责和政策变革指明依据和方向, 从而切实作用于危机走向。这些发现启示危机管理者高度重视和积极回应框架竞争中的公众选择, 提升自身的战略主动性和行动敏捷性。此外, 危机管理者还需明确框架竞争的工具属性, 防范其与危机化解、公众权益、社会稳定等价值属性的错置。

鉴于框架竞争、公众选择、危机走向三者组成了复杂的互动系统, 这意味着仍有一些重要问题值得深入探讨。(1) 当框架竞争者的身份发生变化, 比如在政府之间、媒体之间、国家之间的框架竞争中, 抑或有民众意见领袖参与时, 研究所构建的整合式模型是否仍然适用, 该从哪些方面进行调整。(2) 政治环境和政策环境对框架竞争具有外在规定性, 而框架竞争也会产生政治影响和政策影响, 因而框架竞争与政治政策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值得专门讨论。(3) 鉴于中西方公众有着不同的信任偏好, 即差序信任和距离悖论<sup>①</sup>, 后续研究可开展跨国的案例比较, 选择框架竞争者和框架类型相似的案例, 分析公众信任偏好的差异对框架竞争结果、公众选择生成与危机走向确定等带来哪些不同的影响, 厘清内在的作用机理。

## 参考文献

- [1] Benford, R. D., D. A. Snow.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0(1).
- [2] Entman, R. M. 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993(4).
- [3] 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4] De Vries, M. S. Framing crises: Response patterns to explosions in fireworks factories[J].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2004(5).
- [5] Benford, R. D.Jr. *Framing Activity, Meaning, and Soci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The Nuclear Disarma-*

<sup>①</sup> 距离悖论是西方公众的典型偏好, 指的是人们更相信和崇敬离他们较近的政府官员, 认为离他们较远的政府官员通常是懒惰的、不称职的、不诚实的。这与我国公众差序信任的偏好截然不同。具体可参见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第2版), 张成福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第126页。

- ment Movement[D]. Austin: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87.
- [6] Ryan, C. *Prime Time Activism: Media Strategies for Grassroots Organizing*[M]. Cambridge: South End Press, 1991.
- [7] Nyberg, D., C. Wright, J. Kirk. Fracking the future: The temporal portability of frames in political contests[J]. *Organization Studies*, 2020(2).
- [8] Eising, R., D. Rasch, P. Rozbicka. Institutions, policies, and arguments: Context and strategy in EU policy framing[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15(4).
- [9] Olsson, E.K., L. W. Nord. Paving the way for crisis exploitation: The role of journalistic styles and standards[J]. *Journalism*, 2015(3).
- [10] Griffin, L. Scales of knowledge: North Sea fisheries governance, the local fisherman and the European scientist[J].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09(4).
- [11] Canel, M. J. Communicating strategically in the face of terrorism: The Spanish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2004 Madrid bombing attacks[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012(2).
- [12] 马得勇. 政治传播中的框架效应——国外研究现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政治学研究*, 2016(4).
- [13] Hood, C. The risk game and the blame game[J].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2002(1).
- [14] Olsson, E. K., L. W. Nord, J. Falkheimer. Media coverage crisis exploitation characteristics: A case comparison study[J].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2015(2).
- [15] Boin, A., P. Hart, A. McConnell. Crisis exploitation: Political and policy impacts of framing contests[J].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2009(1).
- [16] Pille, C., R. Prins. The framing contest unravelled: Mayors, framing strategies and political outcomes in the wake of three riot-related crises in the Netherlands[J].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2018(4).
- [17] Boin, A. The transboundary crisis: Why we are unprepared and the road ahead[J].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2019(1).
- [18] 郑石明, 宋悦. 灾害治理组织网络的演化机理: 一个“结构-过程-价值”整合性分析框架[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3).
- [19] [美] 罗伯特·K·殷. 案例研究: 设计与方法(第5版)[M]. 周海涛, 史少杰,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
- [20] 新华网. 敦煌防沙最后屏障几近失守[EB/OL]. [http://www.xinhuanet.com/2021-01/20/c\\_1127012251.htm](http://www.xinhuanet.com/2021-01/20/c_1127012251.htm), 2021-01-20.
- [21] 甘肃发布. 甘肃成立调查组赴现场调查媒体报道的敦煌万亩沙漠防护林被毁问题[EB/OL]. [https://mp.weixin.qq.com/s/PFqM6mEZZzGebJuuo\\_Sniw](https://mp.weixin.qq.com/s/PFqM6mEZZzGebJuuo_Sniw), 2021-01-20.
- [22] 甘肃省人民政府. 阳关林场防护林被毁问题调查情况通报发布[EB/OL]. <https://www.gansu.gov.cn/gsszf/c100002/c100006/c100007/202101/1367162.shtml>, 2021-01-26.
- [23] 新华网. “敦煌毁林案”: 13 300 亩还是 6 000 亩? 有图有真相[EB/OL]. [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21-01/27/c\\_1127032453.htm](http://www.xinhuanet.com/local/2021-01/27/c_1127032453.htm), 2021-01-27.
- [24] 新华社. 生态环境部回应敦煌毁林报道: 现场调查基本结束 如发现问题将严肃问责[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1/28/c\\_1127036394.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1/28/c_1127036394.htm), 2021-01-28.
- [25] 新华网. 有关方面公布关于甘肃省敦煌阳关林场防护林被毁有关问题的调查情况[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3/19/c\\_1127230751.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3/19/c_1127230751.htm), 2021-03-19.
- [26] 全媒派. 刘万永对话王文志: 调查记者是怎样炼成的?[EB/OL]. <https://new.qq.com/rain/a/20210425A01MHS00>, 2021-04-25.
- [27] Lu, X., L. Xue. Managing the unexpected: Sense-making in the Chinese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6(2).

- [28] Weick, K. E., K. M. Sutcliffe, D. Obstfeld. Organizing and the process of sensemaking[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5(4).
- [29] 吕孝礼, 付帅泽, 朱宪, 等. 突发事件协同研判行为研究: 研究进展与关键科学问题[J]. 中国科学基金, 2020(6).
- [30] Klein, G., E. Eckhaus. Sensemaking and sensegiving as predicting organizational crisis[J]. *Risk Management*, 2017, 19.
- [31] [荷]阿金·伯恩, 保罗·特哈特, [瑞典]埃瑞克·斯特恩. 危机管理政治学: 压力之下的公共领导能力[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0.
- [32] 李宏. 公众危机意识、媒体传播偏向与舆论的回归[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5).
- [33] Latour, B.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4] 王婷. 政府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话语噪音及意义构建[J]. 中州学刊, 2018(6).
- [35] 李连江. 差序政府信任[J]. 二十一世纪, 2012, 131.
- [36] 吕书鹏. 差序政府信任: 概念、现状及成因——基于三次全国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J]. 学海, 2015(4).
- [37] 陈丽君, 朱蕾蕊. 差序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及其内涵维度——基于构思导向和扎根理论编码的混合研究[J]. 公共行政评论, 2018(5).
- [38] Boin, A., C. Kofman-Bos, W. Overdijk. Crisis simulations: Exploring tomorrow's vulnerabilities and threats [J]. *Simulation&Gaming*, 2004(3).
- [39] 周雪光, 练宏. 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 一个“控制权”理论[J]. 社会学研究, 2012(5).

## Framing Contest and Crisis Direction: Public Choic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ime-space, Form and Preference

MA Yong-chi, REN Hao-jie, KANG Chuan-bin

**Abstract:** After a crisis, relevant parties engage in framing contest with the public as the face, attempting to maximize public recognition and gain initiative in crisis response and handling. However, current research on framing contest overlooks public choice and lacks a dynamic examination from framing contest to crisis direction. This study starts from the key intermediary of public choice and selects the Yangguan Forest Farm incident in Gansu Province as a typical case. Based on the pres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ase, an integrated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ming contest, public choice, and crisis direction is constructed.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spatiotemporal context of sensemaking, the formal differences in sensegiving, and the inherent preference for differential trust affect the public's judgment of crisis presence or absence, the authenticity of evidence, and the judgment of good or evil of the subject. These three judgments work together to generate public choices and establish a dominant framework. The dominant framework that carries public attention is the target and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resolving crises, providing a basis and direction for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and policy change, thus effectively affecting the direction of crises. The study provides a suitable entry point for opening up the black box of the impact of framing contest on crisis direction, which helps to deepen crisis manager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ming contest, public choice, and crisis direction.

**Key words:** framing contest; crisis direction; public choice; dominant framework

(责任编辑 周振新)